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统一总理 ——科尔传

〔德〕维尔纳·马泽尔 著
马福云 译



A1002512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译 序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德国重新统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东欧剧变、苏联衰败的条件下，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运用自己的智慧，本着自己多年的政治追求，征得英美苏等大国的支持，利用和平，民主的手段，使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合二为一。两德的统一使科尔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赫尔穆特·约瑟夫·米夏埃尔·科尔 1930 年 4 月出生于德国的路德维希港，童年的科尔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科尔开始了中学的学习生活。他对政治极感兴趣，并在 16 岁还在上高中时就参加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次年，参与创建了青年联盟。1950 年中学毕业后，先后到法兰克福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攻读历史、法律和政治学，并在 1958 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年轻的科尔在政界平步青云。1955 年担任基督教民主联盟莱因兰—法尔茨州执委会委员，1966 年当选为州基民盟主席，并在 1969 年，当选为莱因兰—法尔茨州州长。在担任州长职务期间，科尔致力于州的政治组织建设，并努力发展州的教育、经济等，取得了良好的声誉。

1976 年 12 月，科尔辞去州长职务，移居波恩。不久担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联邦议院议会党团主席，成为反对党领导人。1982 年，在政府倒台后，就任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总理。次年，联盟党在联邦议院大选中取胜，科尔领导的政府得到承认。

1989年，在东欧剧变的形势下，科尔发表了联邦政府声明：“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在自由和统一的欧洲实现自由和统一的德国。”同年11月，他草拟和宣布了重新统一德国的“10点计划”。12月和民主德国临时总理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了商谈。1990年5月作为两德统一的第一步，签署了被称为《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的国家条约。6月，两个德国议院分别批准这一条约，两德正式实现统一。1990年12月，德国大选，科尔成为统一德国的第一任总理而被载入史册。

本书详细介绍了科爾的成长历程，尤其着重阐述了他的两德统一思想、观点、主张，以及他所采取的行动。书中资料翔实，内容丰富。

译者

2000年3月17

目 录

译 序	(1)
第一章 代序	(1)
第二章 “晚生的福分”	(6)
第三章 “有朝一日我要当一州之长”	(22)
第四章 知识宝库——母校	(40)
第五章 总是他最年轻	(51)
第六章 一州之长	(76)
第七章 新大陆——波恩	(107)
第八章 炼狱	(122)
第九章 “非科尔莫属”	(143)
第十章 入主总理府之路	(158)
第十一章 联邦总理	(180)
第十二章 “他现在就是基民盟”	(252)
第十三章 统一德国的总理	(278)
生平年表	(310)

第一章 代 序

“德国到底有多大？”1930年4月3日，位于莱因河畔路德维希港市的《总汇报》问道，接着指出它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丢失的领土，“德国在战前拥有6500万人口，540858平方公里土地，而今天则减少到了472082平方公里。”

第二天，这是一个星期五，住在法兰肯塔尔的弗兰肯人约翰·卡斯帕尔·科尔，一位43岁的税务秘书和预备役中尉，军官在法兰肯塔尔的区公所和路德维希的天主教牧师室那儿申报其第三个孩子的诞生，孩子在4月3日6时30分在路德维希港市立医院出生，他和他的妻子采齐利娅为他取名赫尔穆特·约瑟夫·米夏埃尔。

15年以后，当这位名为赫尔穆特的公职人员之子不得不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后果离开父母家时，与德国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又重新被人们讨论了。1945年7月18日，美国总统哈里·斯·杜鲁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苏联的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在波茨坦商谈，现在的德国是什么，它到底是不是还存在着。苏联的会议记录中写道：

“丘吉尔：我仅想提出一个问题。我注意到，这儿用了‘德国’这个词。目前‘德国’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可以将它理解为战前的德国？”

杜鲁门：苏联代表团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斯大林：德国就是指它战后变成的样子，另外一个德国今

天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杜鲁门：是不是可以说是 1937 年，即战争以前的那个德国？

斯大林：是今天 1945 年的德国。

杜鲁门：它在 1945 年丧失了一切。德国现在事实上并不存在。

斯大林：像我们那儿所说的那样，德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我们暂且就这样来理解它吧！不能不考虑战争的结果。”

战胜国的头头们最后取得一致，讨论和决议的基础应该是以 1937 年疆界内的德国和西方大国于 1944 年在伦敦业已为战败的德意志帝国日后版图所构想的领土为基点。波茨坦的会议记录没有提到伦敦决议，其中写道：

“斯大林：请您让我们将波兰的西部边界确定下来，这样，德国问题就会变得明了一些。我很难说，目前应把德国理解成什么。这是一个没有政府、没有固定边界的国家，因为边界不仅让我们的军队来划定。德国目前没有任何军队，包括边防部队，它被分成了几个占领区。现在您来进行界定，什么是德国！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

杜鲁门：我们不妨以 1937 年的德国边界为基点？

斯大林：以什么作为基点都可以，总是要有个基点，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接受 1937 年。

杜鲁门：这是凡尔赛条约以后的德国。

斯大林：可以，可以接受 1937 年的德国，不过这只是作为……一种为方便我们工作而进行的假设。

丘吉尔：只是作为出发点，并不是说我们将会受它的约束。”

苏联人所承认的波兰政府早在 1945 年之初就在向西推进的红军庇护之下，在直到奥得—尼斯河一线的德国领土上构建了波兰行政机构，并按照斯大林的意思造成既成事实。西方则

面临斯大林政策造成的附加后果。500 万德国人从东部地区逃到帝国西部，还有 300 万人在逃往那儿的路上，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房荒、饥荒和其他紧迫问题，以至最初还把将德国人从东部地区驱逐出来称作“最令人满意、最持久的措施”的丘吉尔，面对逃亡的人流也害怕起来，声明说：“我们绝不期望看到我们背上一个人口超载的残废的德国这个包袱。”

德国人在挨冻受饿。洗涤剂、药品、木材和煤等都是紧缺商品。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由英美和姗姗来迟的法国所提供的物质援助能够减缓一些饥饿，防止或遏制疾病，帮助弄到住房和衣服等缓解战争造成的其他后果。但是全面的、目标明确以及为长远着想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在西部地区却没有。

约翰·卡斯帕尔·科尔，这个以前的中央党选民和历来爱国的高级财政秘书，在 1944 年 58 岁时因为一次心脏病发作而作为预备役上尉退出了德国国防军，回到 80% 已被破坏殆尽的路德维希港。他的长子仅 18 岁的伞兵瓦尔特·科尔，在其军事部队撤退至哈尔腾的途中在威斯特伐伦死亡。而赫尔穆特，15 岁的中学生，则在 1945 年初夏辗转从贝希特斯加登的“送儿童去农村”疏散营地返回到自己的父母家中。

战争正式结束的前两天，赫尔穆特·科尔徒步上路，从贝希特斯加登经过弗赖拉辛和奥格斯堡向家乡进发。自从 8 月份战胜国在波茨坦决定了它们对战败的和被占领的德国的措施以来，他在位于美因河畔明斯特/施瓦察赫附近的迪尔施塔特一家共拥有 1200 摩根的南德糖业股份公司大农场作学徒谋生，一直当到 1945 年 11 月中旬。因为战争及其后果，有劳动能力的男农工极度缺乏，他必须为每月 26 个马克的净工资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干活，挤牛奶和照料母牛，用牛耕地耙地，喂猪，以及其他这个“城里人”从来就没有干过的活。看到正在蔓延的饥荒，亲戚和熟人们都没有不乐意他将来当个农民，但

也不得不承认，很难违背这个 15 岁的孩子自己的意志，即使他看上去确实很卖力气。

在他于 1945 年 11 月目标明确地重新捡起因为战争而中断了的学业时，历史走上了正轨，朝着至少还是在波茨坦会议时既没有人预言又没有人愿意的目标行进。同苏联打交道相对而言尚没有经验的西方大国，看不到日后一项德国政策的前景。例如，被外国新闻媒介后来宣称为科尔“祖父”的、于 1945 年 6 月 26 日在占领区和州一级以全德为努力目标建立起来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后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 1945 年 7 月 5 日给一位住在伯尔尼的德国记者写信道：“我日益忧虑地注意到德国事态的发展。俄国令一张铁幕落了下来。我不相信，它在管理托付给它的一半德国时，会让自己接受中央管制委员会的任何影响。较有远见的英、美当局一定也会采取这种立场，因为它们没有希望将来从德国的这一部分再得到食品供应。英国、美国以及随后的法国占领区在管理方面更是一片灾难性的混乱。我确信，目前管理这些地区的军事当局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恶意，但他们十分缺乏对德国的了解，缺乏管理经验，尤其是缺乏眼力，不懂得这个剩余的德国对欧洲、特别是对中欧，从而对英国和法国，归根结底也是对美国，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45 年后欧洲的情况看上去完全不同了。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的首脑们满怀希望地盯着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他们对他们而言，正像 1989 年 11 月 18 日英国《金融时报》所写的那样，是“欧洲最重要的人物”。法国的公众——根据由《费加罗杂志》发起、通过“索弗斯”民意研究所进行的一次有代表性的民意测验——早在 1989 年 6 月已将他抬到继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之后“威望最高”的国家领导人。美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对他也抱着这种看法。对于一大部分德国新闻

媒介逐渐把赫尔穆特·科尔描写成 80 年代最受人低估了的人物，其原因不仅在于党派政治的门户之争，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德国人自从希特勒以来完全没有评价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并给他在历史上排座次的专门问题。

这位在 1982 年 10 月 1 日被德国联邦议院多数通过的一项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案遴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的赫尔穆特·约瑟夫·米夏埃尔·科尔又是何许人呢？

他是否应该把其形象归功于自己的政治能力、自己的气质、性格构成、领导能力以及政治远见，或者他仅仅总是运气好而已呢？

1898 年圣诞节第一天，《柏林画报》开始就“世纪总结”进行调查，它要求其读者——无论年龄和性别——“踊跃参与”并回答 27 个给定的问题，几千人这样做了。奥托·冯·俾斯麦被绝大多数的人选为不仅是“德国最重要的人物”，而且也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国家领导人”。

如果说，在 20 世纪末，当问到谁是本世纪后半叶成就最为卓著的德国领导人时，结果名单上出现的是赫尔穆特·科尔的名字，这是否合理和现实呢？他是否注定要成为奥托·冯·俾斯麦之后所有德国人的总理，和俾斯麦后的帝国、魏玛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全部内阁首脑完全不同——他们都只是维护当时国家受到限制的德国领土的现状，而是发展一种不仅仅为德国的深谋远虑的战略并持久地将其付诸实施呢？

这位对目标孜孜以求地走进实际政治的历史学家，最晚从 1966 年秋天以来就坚持不懈地追求、并在 1989 年利用形势，按照自己的意图实现了两个德国的重新统一，他是不是有才能和手段，在互相对立的大国和各种势力的纵横捭阖中实现自己历史性的构想呢？

本传记试图回答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这些。

第二章 “晚生的福分”

在赫尔穆特·科尔出世的当天,《总汇报》报道说,路德维希港市的预算中共亏空了 1625000 马克。经济和统计局称,每人每月的生活费用指数为 157.70 马克。在引起世界经济危机的纽约交易所“黑色星期五”以后不多几个月的时候,工业国中固然没有任何地方看起来充满希望,但德国——在 1930 年 4 月有 380 万失业者——除此之外还要被迫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缴纳几乎无法估量和无法筹集的赔款。帝国财政面临破产,最后是在英国有很高声望的帝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在 1931 年通过那份由他发起的一年期的胡佛备忘录才使破产能够幸免。

被他最小的儿子后来描述为“精力充沛的人”的财政公职人员约翰·卡斯帕尔·科尔,虽然一直有一份固定的薪金,但这并不能让他和他的家人“办好多事情”,更不用说刚刚成立的新帝国政府迫于财政危机,不得不减少公职人员的工资。除了这一切之外,在路德维希港这个令人感到不安的动乱策源地,正好在这几个星期中,由法国撑腰的、力图将法尔茨从帝国联盟分离出去的分裂主义分子进行着不容轻视的捣乱活动,他们企图令德国的行政机构陷于瘫痪,而且在一直还作为占领军驻在当地的法国莱因军的庇护下,对居民肆无忌惮地采取恐怖行动。

在柏林,由帝国总统在出生于曼海姆的帝国总理赫尔曼·

米勒的政府被推翻后任命的海因里希·布吕宁内阁在4月2日登台亮相，内阁成员除总理之外，还有另外两名中央党政治家，德国民主党和德国人民党各两位部长，一名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代表，一名经济党代表和一名没有党派的政治家。赫尔曼·米勒是自从1920年以来的第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他从1928年6月至1930年3月底领导着一个大联合政府，因为联合政府对增加失业保险费的普普通通的争吵而被迫让位于中央党人总理布吕宁，后者只要再得到帝国总统的信任便可以了。一个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一下子——对魏玛共和国的政党的行为而言当然是很典型的——变成了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它让联合政府的党派，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人民党，迅速分道扬镳，乃至几乎两年之久的合作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

“按照帝国总统先生对我的委任，新的帝国内阁不再对联合政府负责”，新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于4月1日在帝国议会上宣称道，并纲领性地补充说：“利用本届帝国议会来解决问题的，将是最后的尝试。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得起拖延国计民生所必须的工作的责任。……帝国政府感到有足够力量，运用基本法赋予我们国家制度的手段来克服一切紧急的威胁。”

德国社会民主党推卸了维护国家民主的责任，给现在产生的内阁让出了路。这“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有声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议员、前少尉尤利乌斯·勒伯尔写道，接着他又对本党的政策评论道：“因为害怕承担责任，……社会民主党抛弃了自己的影响和权力。目前它不得不为责任问题而承担责任，却不能为此换回丝毫权力和影响。这对它而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了。许多追随者不再理解自己的党，因为他们看不到胆怯和不彻底性的灾难，他们看不到过去几年党领导的内在的无能。”

52年以后，1982年10月1日，当第一次在分裂的德国又

一位被自己的党抛弃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即施密特与其内阁被推翻时，是 52 岁的赫尔穆特·科尔接替了这个职务并组织了一个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

1930 年 4 月 3 日，在莱因河畔的化学城中午的气温差不多达到 20 度，这一天不只是在路德维希港城区弗里森海姆内的霍亨索伦街 89 号——这里住着赫尔穆特的外祖母——被当作特别的日子记录了下来，这一天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齐柏林伯爵”飞艇开始了本年度的“处女航”；科西玛·瓦格纳，1837 年出生的弗朗茨·李斯特有名的女儿，在拜罗伊特被火化；在莱比锡，15 年后按照希特勒指示被视为施陶芬贝格伯爵身边重要的阴谋分子被处死的反希特勒人士弗里德里希·卡尔·格德勒成为市长。

路德维希港在希特勒入主帝国总理府的前一年是一座拥有 35000 名职工的化学城，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曾经在 1859 年授予该市以独立公社的权利，如今它已不复是一块能向其居民预示有一个安宁前途的福地了。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有 12000 人。这一状况加上直到 1930 年 6 月底驻守在这里的令人痛恨的法国占领军，以及受其支持的咄咄逼人的分裂主义分子，均使它成为孳养极端政治意识形态的肥沃土壤，这种意识形态向不满的、从 1918 年以来民族认同意识往往在神经机能上受到伤害的市民们许诺以一种马上能“光复的可能”。历史的延续性受到了伤害，它在路德维希港激起了一种特殊的民族感情。

纳粹主义分子很早就明白利用这种感情。还在 1922 年春，他们就在曼海姆建立起了巴伐利亚之外的第一批地方组织。在希特勒接管政权以前十多年，短短几个月内就有 178 人在那儿加入了纳粹党，他们并不是工人或失意的资产阶级“分子”，而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他们来自例如从 1865 年起在毗邻

的——与曼海姆只隔着一条莱茵河——路德维希港扎根的巴登苯胺和苏打工厂，还有公职人员、职员、商人和店主。

1984年1月25日当科尔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在耶路撒冷的国会中谈到——在德国是被以一种对历史的完全无知来解释并加上老一套的恶意中伤的——“晚生的福分”时，他是明白他所谈论的问题的。他说：“我要在这里首先十分明了地说明一点，正由于我是出自希特勒之后的一代人中的第一位联邦总理——当我是孩童时我也经历了战争，在一个反对纳粹的父母的家庭中十分清醒地经历了纳粹时期。无论你们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是读到和听到些什么——在这个联邦共和国里没有一种新的极右主义的危险。……这尤其是指没有经历过这一段历史即那个时代的历史的青年一代。……刚才我有幸，总统先生，向您呈献一部您特别推崇的罗伊希林的著作，他就体现了我国人民和我们共和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共和国就生存在这种精神之中。这一点也适用于所有的人，尤其是年青的一代。……我作为一个在纳粹时期能够没有陷入罪孽的一个人补充这么一点，这是由于，这个人曾经得到了晚生的福分，也得到了有一个特殊父母家庭的幸运。”

谁如果是在纳粹统治时期正处在一种对一般外界影响和特殊的周围环境一般会留下长久印象的年龄，谁就会在1945年以后很难摆脱精神和道义上的创伤，以及对1945年前这段时期的情理的负罪感。不少杰出的年纪较大的德国政治家一定都有这种体验。鉴于不仅对历史，而且对年青人易受诱惑的了解，赫尔穆特·科尔公开承认，因为自己的晚生而没有遇到这样的危险，在这方面他碰上了好运气。

他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他的信教并积极参加教会活动的双亲按照普鲁士模式治家的、堪称为典范的公职人员的家风。对于他的双亲，他在60岁时说道，他们“笃信”自己的天主教。

天主教教会对他们而言是“保护性和创造性的中心”。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他们的生活能力和在克服生活中的难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执着和顽强均来源于此。母亲不仅只是“圣经通”，而且也十分清楚天主教“圣徒”们的历史，她“按各自需要和主管事务召唤”他们。然而在宗教方面，她的态度是极为宽容的，她以各种方法尊重新教教会。不仅如此，当收音机转播礼拜仪式时，她一般不听天主教的，而听新教的布道，她感到这要比天主教的“更透彻、更深刻和更好”。对父亲而言，宗教宽容是不言而喻的事，因此他——即使在生命快结束时也——根本不说此事。

约翰·卡斯帕尔·科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个时代国家公职人员的典型代表者，他给自己的家人和周围的人们以自己的水平尽可能作出理想的示范：忘我地工作，忠于职守，献身于国家思想以及和国家保持一致，尽管这个国家并不绝对符合他的理想。他的工资不允许过多的花费。即使科尔利用他的居住在下弗兰肯的父亲的田庄而有一些农产品储备，使他有时不必去购买某些食品，但家人的个人愿望和奢望仍受到相对而言固定的、很紧的局限。当然，像这样一种原来共有 13 口人——父母和 11 个孩子（其中 5 个都在 12 岁以前死去）——的家庭基础，过日子总要受到限制。尽管自从 1932 年以来——他岳母在 1932 年 4 月 6 日去世后，他就与其家人住在弗里森海姆岳母遗留下来的宽敞的房子里，不用交房租，但这并没有使情况有根本改变、能“办好多事情”。他所照管的家禽、140 棵果树以及在 140 米长的花园里的土豆和蔬菜地也不能贴补多少生活开支，让他和他的一家能轻松地过一种无忧无虑的日子。

赫尔穆特·科尔在 1990 年 2 月回忆说，父亲的收入足以“与地位相称”地赡养一家，“我们不必为了每天的面包操心，

没有人挨饿。”即使在当时非常不常见的荤菜，科尔家也不断顿，虽然一般每星期只有两次。每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科尔太太做面食和鸡蛋，星期五是鱼，星期六是大锅菜。凡上桌的菜，每人都有吃的。“没有人搞特殊”。在星期天和节日是传统的“家庭聚餐”，在那些日子里，父亲让人将自己的啤酒带到家里来。

采齐利娅·科尔有条有理地设法低价买来自己花园里没有的食品。她一般只在商贩已快收摊、而将其还没有卖出去的东西廉价出售时，才去市场。科尔回忆道，“我们每个人凡能节省的地方，都必须节省。我很早就学会节制、理智地估计现实情形、接受限制，生活上不追求享受。”仅仅在赫尔穆特过生日时，“家里才挤满了人”，他的伙伴和同学都是他的客人。他说，“这时就有大量的我母亲亲手烘烤的蛋糕。我的客人和我喜欢的可可和甜食，在这样的日子里应有尽有。”礼品只有在圣诞节和生日时才会有，但它们大都是些“实用的东西”，如袜子、衬衫和毛衣。他曾经在圣餐仪式上得到过一件怀表赠品，条件是，只有当他“以后”“长大了”的时候才能拿出来使用。他父亲在1935年曾从城市给他买来一辆自行车，这是辆旧车，“仅花费了8马克”。

在奉信基督教的双亲家庭里，传统的天主教礼节虽然占着主导地位，但它并不会“束缚”任何人。父母思想自由，具有温和的民族意识。他们看不起传教士在宗教上的、民族的甚至民族主义的装腔作势。如赫尔穆特·科尔所说，“他们对德国的历史胸中有数，为自己的人民和祖国文化成就感到骄傲，将自己溶入祖国的历史之中，但他们也同样让‘其他人’的传统和观点发挥作用并尊重它们。”物质条件最终也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比如说，他们是如此地喜欢音乐和戏剧，却又难得花得起钱去听音乐和看戏。

过圣诞节时虽然没有那种年青人的淘气和欢腾，但也和赫尔穆特过生日时一样铺张。全家先去参加天主教圣诞夜弥撒（整个战争期间都是这样），随后父亲或母亲便给孩子们读新约中的圣诞故事。赫尔穆特的姐姐弹钢琴奏圣诞曲，大家热情洋溢地跟着唱歌。他 60 岁时沉思似的说道：“多么美好、古老的圣诞曲！”赫尔穆特从很小起就被安排到家务劳动中了，他照管母鸡、雌火鸡和家兔。他有条有理地饲养他们，不时还弄一次兔子展览。他也学习改良果树，有一段时间曾打算成为农民或森林管理员。

父亲骑自行车“上班”，尽管这位房产所有者、公职人员和小康的中产阶级者没有特别的金钱之虞。仅仅是在天气特别不好时他才花钱坐电车奢侈一下。他在花园中度假，或者与家人一起在下法兰肯他的亲戚家度假，在那儿，大伙儿——父亲、母亲和孩子们都必须在干活时帮上一把。科尔家里自从 30 年代下半叶起就有了一台所谓的“大众收音机”，一种价值不到 40 马克的无线电广播接收机。订阅的报纸是路德维希港的《总汇报》。

赫尔穆特·科尔在孩提时代经历了早他 37 年出生的公职人员之子汉斯·法拉达已经明白的事情。他不得不穿哥哥的衣服、干各种各样的活儿并学习估量钱的价值。“真是要算计”，法拉达写道，“每一个芬尼，为每一个新的又能省下几芬尼的机会而感到高兴。……钱就是工作，常常是报酬非常低的工作，因此不珍惜钱是有罪的和让人瞧不起的。”

在路德维希港，学生赫尔穆特在学校开始上课前一大早就在莱因河里捞河虾，然后将其出售，正如他把自己辛辛苦苦养的蚕茧按每公斤 20 马克交售给“国家”一样。如果是没有自己通过不断的工作和实用的主意挣点钱，他轻易得不到什么东西。

宗教信仰以及与天主教会的紧密联系，魏玛共和国时代富有生命力的国家公职人员的伦理道德，根深蒂固的农民传统观念以及精神上不加掩饰的民族认同意识，所有这些都保护了约翰·卡斯帕尔·科尔，使他没有去接受纳粹分子的世界观。但除此以外，他之所以能比大多数人更早地、与众不同地认识到，尽管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作了效果显著的宣传，他们也不可能创造奇迹，这主要应归功于他每天办公要处理的两方面工作。当他们将农民政策——他们视此为自己意识形态的核心——不只在德国被吹捧为史无前例的时候，科尔就通过自己的职业工作明了，表面现象和实际情况绝对不能混为一谈，他还通过自己的工作差不多每天都获悉，被大加赞颂的国家婚姻贷款与纳粹所宣传的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宣传和现实的明显差异一定引起了这位农民出身的信教的财政公职人员的忧思，以至他觉得，反对政府及其世界观，不再非有其他的标准不可了。约翰·卡斯帕尔·科尔反对政府那种压力越来越大的让公职人员驯服的方法，这无疑对他的升迁不利。本来，只要对政府表示出明显的好感并表现出老实听话的样子，升迁的大门如今是大敞四开的。他，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农家之子，与早他 11 年在“他的”小村庄出生的天主教社会政治家、并当过一时魏玛共和国的交通和劳工部长的亚当·施特格瓦尔特同样，在维尔茨堡附近的格罗森海姆的同一所国民小学上过学，也就是说，他具有从纳粹意识形态审视属于在纳粹国家最有条件升迁的履历。虽然只上过国民小学，并且这以后当过一段时期磨坊工人，但他是作为一个巴伐利亚军团的所谓勇敢军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复员回家的，而且最终在 1918 年在巴伐利亚的财政部当上了公职人员。

1936 年，当他最小的儿子在复活节时开始在弗里森海姆区上国民小学时，他的最高领导机构帝国财政部发下一份国务